

※「經學文獻與思想流變」專輯※

經學史上的千古公案：「周公稱王」 問題的源起與爭議

張琬瑩*

一、前言

周公姬旦是否「攝政稱王」的問題，為經學史上一大公案，自戰國、秦、漢以來，就流傳有不同的說法。究竟周公是以何種身分輔助周成王治國的？後世在此問題上，形成兩個一直未能調合的派別：一是主張周公以臣子的身分輔佐成王；一是主張周公登基為王，攝政稱王。迄於近代，論者始終爭辯不絕，至今未能取得一致共識。正如晚清今文家廖平(1852-1932)所說：「周公、成王事為經學一大疑。」¹

周公的爭議，與其在西周初期的政治舞臺上占有重要地位有關。據《史記·魯周公世家》記載，周公幼篤行仁孝，多材多藝，周武王在位時，周公即全力輔翼，並以忠誠見稱於史。如克殷後二年，武王有疾，當時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群臣憂懼，周公遂向先王占卜求助，「周公於是乃自以為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於太王、王季、文王」²，願以自身替代武王。及至武王去世後，周公又擔負起安定天下、鞏固周王朝統治的重任。一般載籍以為，武王崩，成王年幼，周公便毅然暫行天子之政，為穩定周王朝的統治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尚書大傳》鋪陳周公的德業就說：「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

* 張琬瑩，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¹ [清]廖平撰，楊世文點校：《經話·甲編》卷1，收入舒大剛、楊世文主編：《廖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冊，頁234。

²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魯周公世家》，《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卷33，頁1516。

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³雖然《尚書大傳》七年之業的說法，未必完全準確可靠，但周公為建立周王朝的盡心盡力，歷來深植人心。清代學者孫詒讓(1848-1908)云：「粵昔周公，繼文、武之志，光輔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憲，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⁴此與周公在其時代對周王朝的貢獻，不無關聯。

因為周公身分的特殊及其功業的顯赫，所以歷來的統治者與儒家學者，不乏有人援引周公的形象及其事蹟，來作為自身政權或學說的合理依據。其中，最受後世爭議與批評的，莫過於西漢末年的「王莽代漢」事件。鑒於對王莽事件的負面印象，後世經學家開始有意識地考辨《尚書·周書》以及其他經典中有關周公的記載，企圖透過解釋、澄清經書裏的相關篇章及字句，來證明周公未曾有過僭越稱王的意圖和作為。及至近代，又有學者批判傳統經學家泥於君臣大義，而力倡周公稱王乃是西周史實。眾說紛紜之因，在於時代久遠，直接記載周公事迹的文獻有限，且倖存的資料如《尚書》等典籍，其文字又詘屈聱牙、晦澀難懂，致使後人在認字釋義上產生不少分歧，爭論亦紛紛無由得解。

本文以三部分論述「周公稱王」問題的起源與相關爭議：(一)關於「周公輔政」兩次在西漢政治史上的複製重演，以及王莽代漢所引發的批評與後續效應；(二)歷代論辯「周公稱王」所涉及的相關文獻與問題癥結；(三)經典權威瓦解後，近代如何運用紙上與地下材料考辨「周公稱王」問題，以及學者各持論點的四種立場與主張。

二、西漢兩次仿效周公輔政及王莽代漢引發的爭議

春秋、戰國時期，周公的文治武功成為儒家孔、孟、荀等代表人物所嚮往的對象，因此地位迅速躍升⁵。漢人推崇孔子，周公地位亦水漲船高，西漢政壇先後出現

³ [漢]伏勝撰，[漢]鄭玄注，[清]陳壽祺輯校：〈洛誥〉，《尚書大傳》卷4，收入朱維錚主編：《中國經學史基本叢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第1冊，頁40。

⁴ [清]孫詒讓撰，王文錦、陳玉霞點校：〈序〉，《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

⁵ 孔子自言有夢周公之志，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又稱許周公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孟子則將周公功績與孔子作《春秋》並舉，云：「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

霍光(?-68 B.C.)、王莽(45 B.C.-23 A.D.) 仿效周公輔佐幼主的事件，而王莽最後取代漢室，自己稱帝，遂開啟後世論辯不休的「周公稱王」爭議。

(一) 霍光輔政

征和二年(91 B.C.)，時武帝年老，太子又死於巫蠱之禍，因此有意立寵幸趙婕妤之子為後。然慮其年幼，於是觀察群臣，尋找適合託孤的人選。最後武帝看中霍光的才能，認為足堪輔弼重任，於是請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以賜霍光，暗示他日後要仿效周公輔佐成王。

後元二年(87 B.C.) 春天，武帝病篤，《漢書》記載武帝臨終前與霍光的對話：

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⁶

這是西漢史上第一次仿效周公的政治事件。西漢社會當時盛行成王乃襁褓中幼兒的傳說（詳見下論），因此武帝所賜以暗喻霍光的畫，即是以周公背負嬰孩大小的成王作為象徵之意。武帝崩後，剛即位的孝昭皇帝年僅八歲，於是朝政決策大權盡掌於霍光之手，而霍光雖然權傾天下，但在名義上卻始終沒有僭越臣子界線，是以霍光輔政並未招致篡奪之評。

(二) 王莽代漢及其引發的爭議

西漢第二次仿效周公輔政的人物是王莽。王莽早年勤儉好學獲致美名，以外戚身分進入朝廷後，即迅速取得士大夫群體的擁戴與支持。漢哀帝(26-1 B.C.) 崩後，

懼。」荀子於〈儒效〉篇中，以鋪張之筆，描述周公穩定周初政局所施展的政治才能，更盛言周公所作所為「非聖人莫能為之」，並推崇周公乃是「大儒之效」的典範。〔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述而〉，《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7，頁60；〈泰伯〉，同前書，卷8，頁71b。〔漢〕趙岐注，〔宋〕孫奭疏：〈滕文公章句下〉，《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6下，頁118a。〔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卷4，頁114-117。

⁶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霍光金日磾傳〉，《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卷68，頁2932。

平帝 (9 B.C.-9 A.D.) 以九歲之齡繼位，太皇太后王氏臨朝稱制，委政於內姪王莽，莽遂得以進入權力核心。此後，他便刻意將自己塑造成周公的化身，如《尚書大傳·嘉禾》載有越裳氏獻白雉的故事，王莽及其支持者也依樣畫葫蘆：

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於是群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以順天心。」太后詔尚書具其事。⁷

《尚書大傳》的故事原本是說，周公輔佐成王期間，國內得異物嘉穀，而後印證了越裳氏不畏艱途派使節來訪中國，並進獻白雉；透過越裳使節之口，讚頌了中國政治強盛清明，說明周王朝的德澤藉由天象惠及遠方，使他國聞知。而周王朝之所以能夠以德澤感化異邦，其中功勳最鉅者，自然是「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⁸的周公。王莽及其支持者藉由重演周公的傳說，將王莽的形象與周公重疊，周公有功於周王室，王莽也同樣有功於漢室。最後在群臣鼓吹下，王莽比照周公，獲得「安漢公」的封賞。

元始五年 (5) 冬，平帝有疾，王莽又仿效《尚書·金縢》中周公願為武王代死的情節，為平帝祈禱。畢後，依樣藏策於金縢之匱，敕諸公勿敢言⁹。平帝崩，無子，為利於控制和掌權，王莽於是扶立宣帝玄孫中最年幼的廣陵侯子嬰（二歲）繼位，託言卜相最吉。自己則以「如周公故事」的名義，順理成章居攝踐阼：

於是群臣奏言：「臣聞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命。……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

⁷ 班固撰，顏師古注：〈王莽傳上〉，同前註，卷 99，頁 4046。

⁸ 伏勝撰，鄭玄注，陳壽祺輯校：〈嘉禾〉，《尚書大傳》，頁 35。

⁹ 《尚書·金縢》周公祈禱願代王死的情節，在《史記》的記述中，周公前後共展現過兩次類似舉止：一次是周公禱於三王願代武王而死，一次是周公禱於河神願代成王而死。譙周以為，秦火過後，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故造成傳聞錯落的情形。見司馬遷撰，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魯周公世家〉，《史記》，卷 33，頁 1520。班固撰，顏師古注：〈王莽傳上〉，《漢書》，卷 99，頁 4078。

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臣請安漢公居攝踐祚，服天子韍冕，背斧依于戶牖之間，南面朝群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群神，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臣昧死請。」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¹⁰

王莽及其支持者宣稱，周公攝政時「常稱王命，專行不報」，又鼓倡讓王莽一切韍冕、車行、儀節皆依天子之制，其贊稱「假皇帝」，臣民稱王莽為「攝皇帝」，王莽自稱曰「予」，臨朝決事按皇帝之詔稱「制」。其儀文實等同真皇帝身分，僅在太皇太后及皇后面前恢復臣節，並於隔年改元「居攝」。王莽此時權勢已達極盛，但仍須加上個「假」字以遮掩其企圖野心，於是周公也就頂上「假王」頭銜。

王莽自比周公、專權獨斷的行為，自然引發反對者不滿。前宰相翟方進之子翟義，見莽有奪取漢祚意圖，於是起兵東郡，奉劉信為天子，比至山陽，眾十餘萬。史載王莽「聞之大懼」，「日抱孺子（會）群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筭！」¹¹王莽先是把翟義的起兵比作管、蔡叛亂，接著仿效周公討伐管、蔡時作〈大誥〉，亦按字逐句作了一篇誥文，即後世所稱〈莽誥〉。他將誥文開頭的「王若曰」替換成「攝皇帝若曰」，顯然視〈大誥〉中的「王」為周公本人，並將自己比擬成周公化身。最後，翟義舉事失敗而亡。

居攝三年（8），王莽藉口民間所獻符命上奏太后，並引用《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一段，指稱此為「周公攝政稱王」之文，又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其為「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事，毋言「攝」，並改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至此，王莽已露出由假即真的意圖。

同年，王莽即再度利用符命之說，正式逼迫小皇帝退位。自己則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國號曰「新」。史書記載，當王莽讀策完畢，親執小皇帝的手流淚感歎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隨後由師傅

¹⁰ 班固撰，顏師古注：〈王莽傳上〉，《漢書》，卷 99，頁 4080-4081。

¹¹ 班固撰，顏師古注：〈翟方進傳〉，同前註，卷 84，頁 3427-3428。

牽小皇帝下殿，北面稱臣，據聞當時百官臣僚目睹此幕，莫不感動¹²。

新莽一朝最後短命而終，王莽在日後漫長的歷史書寫和士人評論中，也被深深烙上篡位者的惡名。直到近代才有史學家為其翻案，認為王莽代漢有其個人和時勢的因素：一方面是他經營的「再世周公」形象，一方面是當時盛行「禪讓傳賢」以及「漢家氣數已盡」的說法，而王莽正符合朝野知識分子所期待的政治理想，因此他才能獲得多數支持，取而代之¹³。

近代學者對於王莽事件造成的警惕與影響，有兩極化的說法和爭論。一派學者以為，後世經學家為避免再有野心家重蹈王莽篡位的覆轍，因此極力撇清、改造周公曾經稱王的史實。如顧頡剛(1893-1980)就說：

在西漢以前，周公原是一個赫赫有權勢的人物，他「專行不報」，要怎麼做就怎麼做，所以王莽可以利用他的偶像來提高自己的地位，直做到真皇帝。哪裏會像《今本書序》一般，征伐、誅戮、封國、行賞，一切都出於成王的親征和發令，周公只是和召公同等的一個宰相，惟有遵奉王命行事，連攝政都不是了呢？……現在《書序》裏把周公寫得這般地恭順，分明已不是戰國、秦、漢人心目中的周公，而是王莽失敗以後，統治階級懲羹吹齏，對於周公歷史的改造。¹⁴

另一派學者則指出，原本「周公稱王」就是子虛烏有之事，是王莽為了奪篡而編造的藉口，王莽失敗後，這無中生有的故事卻反倒造成後人對周公的懷疑。如程元敏就表示：

周公代幼主治天下，內疑外叛，不得不專權，此在先秦、兩漢典籍並不諱言……然事事皆以成王命出之，未嘗自稱為王。謂周公稱王，王莽難辭始俑之罪。¹⁵

上述兩種說法各自有學者支持。因此，先秦及西漢人（代表王莽以前的說法），對

¹² 班固撰，顏師古注：〈王莽傳中〉，同前註，卷99，頁4100。

¹³ 邢義田：〈母權·外戚·儒生——王莽篡漢的幾點解釋〉，《歷史月刊》第14期（1989年），頁36-44。

¹⁴ 顧頡剛：〈周公執政稱王——周公東征史事考證之二〉，郭偉川編：《周公攝政稱王與周初史事論集》（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頁36。原文刊載於《文史》第23輯（1984年）。

¹⁵ 程元敏：〈論尚書大誥諸篇「王曰」之王非周公自稱（上）〉，《孔孟學報》第28期（1974年9月），頁124-125。

周公執政身分的認知為何？是討論周公稱王爭議的一道重要考辨問題。

三、幾個爭辯不休的問題

周公事迹的考辨，存有不少難以解決的問題。首先，是被視為時代較早且較接近史實的《尚書》文獻，歷來諸家對於《周書》中「王」的身分，有著不同的理解和推測，乃是爭論周公是否稱王最為棘手的部分。其次，是關於成王的年紀，成王年長與否，關係到他是否有親自執政的能力，以及周公實際上的政治影響力及權力究竟如何，成為討論周公是否稱王的判斷依據。其三，是周初的王位繼承制度問題，學者間有「兄終弟及」和「父死子繼」兩種主張的拉扯與爭辯。其四，先秦、兩漢人使用不同詞彙來描述周公的政治身分，這些詞彙如何才算正確的解讀，亦引發學者之間的歧見。以上幾個問題的排列與組合，即構成討論周公稱王爭議的重要問題意識與面向。

（一）《尚書·周書》諸篇的「王」為誰？

《尚書·周書》諸篇為考證周公事迹較早之資料，可信度相對於後世史書與諸子書為高，但因其文字古奧且艱澀難懂，後世解讀往往分歧甚大。關於篇中發布誥命及說話的「王」為誰，學者各有不同理解，其中尤以〈大誥〉和〈康誥〉的紛爭最夥。原因之一，在於王莽詮解〈大誥〉及〈康誥〉的「王若曰」，皆謂之周公，而王莽本身行為具有較大爭議；其次，兩篇部分字句確實有詮解上的曖昧空間，學者可按其立場各自解讀，經常難以取得共識。

1. 〈大誥〉

〈大誥〉為何人所作，據〈書序〉所說：「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史記·周本紀》云：「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同書〈魯周公世家〉又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¹⁶三說皆以〈大誥〉為周

¹⁶ 司馬遷撰，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周本紀〉，《史記》，卷4，頁132；〈魯周公世家〉，同前書，卷33，頁1518。

公所作，並謂周公東征乃是奉成王之命。

但問題是，從敘述中並不能得知成王是否親自與役，倘若成王年紀真如傳聞般幼少，則勢必無法親與東征。若果如此，〈大誥〉中說話的「王」，其真實身分為何，即有不同的想像與解讀空間。

自兩漢以來，學者對〈大誥〉「王若曰」之王的解釋，大致有三種意見。第一種意見是王為周公說。如鄭玄(127-200)注〈大誥〉云：

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¹⁷

鄭玄認為出於行權考量，因此周公在命大事時稱王¹⁸。但由於鄭注出自王莽代漢之後，因而遭到王肅(195-256)以及唐、宋以迄清代多數學者的反對，直至清代中晚期才有支持其說者出現。王鳴盛(1722-1797)《尚書後案》曰：

周公既攝王，此誥是周公之語，故鄭以為周公。若如王肅及《傳》、《疏》謂是周公述王命，則當如〈多士〉、〈多方〉，先言「周公曰」，更言「王若曰」，此文不然，明王謂周公矣。¹⁹

王鳴盛指出，《周書》文誥記錄方式有二種，其一直接以「王若曰」開首，如〈大誥〉篇；其二是文中明言周公以成王之命誥，或是記以「周公曰，王若曰」，表示周公傳達成王命令，如〈多士〉、〈多方〉兩篇。王鳴盛經比對後認為，若〈大誥〉為周公代成王所誥，則記錄應如〈多士〉、〈多方〉兩篇格式。但顯然〈大誥〉與兩者不同，因此可證〈大誥〉乃周公所親誥，史官所記「王若曰」者，實為周公。

然而上述推論並未能有效服眾。原因在於，《周書》諸篇時代先後不同，學者對於各篇正確時序的判讀亦有異。反對周公稱王的學者就指出，〈多士〉、〈多方〉兩篇所作時間正在周公攝政時期，史官記錄以「周公曰，王若曰」，不恰好證明周

¹⁷ 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大誥〉，《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13，頁190b。

¹⁸ 事實上，鄭玄的解釋呈現矛盾不一的現象，如注《禮記·明堂位》云：「天子，周公也。」但其在《箴膏肓》則曰：「周公歸政就臣位乃死，何得記崩？」《發墨守》又謂：「〔魯〕隱〔公〕為攝位，周公為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見鄭玄注，孔穎達疏：〈明堂位〉，《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31，頁575b、576a。

¹⁹ 〔清〕王鳴盛撰，顧寶田、劉連朋校點：〈大誥〉，《尚書後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375。

公並未稱王？順此而推，同為攝政時期的〈大誥〉中王，自然也不是周公²⁰。而諸篇記錄不同，僅是史官書記體例不一所致。

第二種意見是王為成王說。此說主張周公稱成王命以作誥，誥文為周公代作，王則指在位的成王。如《孔傳》曰：

周公稱成王命，順大道以誥天下眾國，及於御治事者盡及之。²¹

孔穎達(574-648)《疏》謂：

周公雖攝王政，其號令大事則假成王為辭。……「王若曰」者，稱成王之言，故言「周公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成王爾時信流言，疑周公，豈命公伐管、蔡乎？……鄭玄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稱為王，則是不為臣矣，大聖作則，豈為是乎？²²

可見孔穎達並未完全遵守「疏不破注」原則，其有意調和鄭玄與《孔傳》之說，認為周公雖攝政，但其號令大事則假成王為辭，實非成王本意。換言之，周公有假傳聖旨的嫌疑。然《正義》畢竟為官修之書，在立場上自然不能支持周公稱王，《疏》於是轉向批評鄭玄的說法不盡確實，因為周公乃是聖人，聖人怎會做出僭越之舉？

此看法頗受宋、元以後儒者共鳴，宋代林之奇(1112-1176)就認為：

然政雖總於周公，而成王在上為天子，號令雖由己出，而必稱王命以告之。此《經》所以稱「王若曰」，而〈序〉則言「周公相成王」，以相發明也。鄭康成曰：「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此言實害教之大者。唐孔氏既已辯之矣。²³

大致而言，在《孔疏》以後，諸儒反對周公稱王的理由，不外乎有害君臣名分大義；且周公為孔子所傾慕，亦居聖人之列，其人格品德必然毫無瑕疵，否則聖人所作經書何以教人？

第三種意見是王為武王說。此說為清人吳大澂(1835-1902)所提出，吳氏《字

²⁰ 程元敏：〈論尚書大誥諸篇「王曰」之王非周公自稱（上）〉，頁 132-133。

²¹ 舊題孔安國傳，孔穎達等正義：〈大誥〉，《尚書正義》，卷 13，頁 190a。

²² 同前註，頁 190b。

²³ [宋]林之奇：〈大誥〉，《尚書全解》（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92 年據北京圖書館藏毛氏汲古閣抄本影印），卷 27，頁 1451。

說》云：「其實〈大誥〉乃武王伐殷，大誥天下之文。」²⁴ 後有民國學者傅斯年(1835-1902)贊同之：

吾友顧頡剛先生謂康叔之封應在武王之世。〈大誥〉乃武王即位之誥，〈康誥〉亦武王之詞。案：寧王一詞，既由吳大澂君定為文王，此數篇中曾無一語及武王者，其為武王之誥無疑也。²⁵

以〈大誥〉之王為武王的主要根據，是認為全篇無一語提及武王，若發布誥命者為成王或周公，基於追述先王的尊重，不應不提及武王。因此，可以推斷發布〈大誥〉者，應為武王本人。而且，據傅氏此篇所言，顧頡剛所持意見相同。

不過，顧頡剛後來的看法顯然有所轉變，因為他另外撰有文章以駁斥吳大澂之說。舉出〈大誥〉非武王時書的兩項證據：第一，〈大誥〉文中有「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以及「殷小腆誕敢紀其敘……曰予復」等句，明指武庚叛亂之事，而事變發生時間在武王亡後。第二，誥文中「敕寧武圖功」一語，按照吳大澂解釋，即是「完成文王、武王的功業」，此業已將文王、武王並舉，誥文豈能說是武王所作²⁶？此番論述確實有力點出武王說難以合理解釋之處。

2. 〈康誥〉

其次，《尚書》中〈康誥〉、〈酒誥〉、〈梓材〉三篇，〈書序〉將之視為一組整體的篇章，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謂三篇為成王封康叔時所作。然而，〈康誥〉三篇問題實頗複雜，歷來不循〈書序〉說者亦多。有認為周公攝政稱王時封康叔所作，有主張武王封康叔於康時所作，眾說紛紜，不一而足。

關鍵在於，若以〈康誥〉為成王所作，篇首兩段即會出現難以解釋的問題。〈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

²⁴ [清]吳大澂：〈「文」字說〉，《字說》（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年據清光緒癸巳年[1893]思賢講舍刊本影印），頁58。

²⁵ 傅斯年：〈大東小東說——兼論魯燕齊初封在成周東南後乃東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頁107。

²⁶ 顧頡剛：〈周公執政稱王——周公東征史事考證之二〉，頁44-45。

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成勤，乃洪大誥治。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康叔為武王之弟，在身分上乃是成王的叔叔，因此成王怎會稱呼康叔「朕其弟」，又喊他「小子封」？顯然在稱謂上並不合情理。對此，《孔傳》採取圓融調和的立場，謂：「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言王使我命其弟封」²⁷。換言之，此篇為周公代轉成王誥命，而周公在對康叔說話時，使用了兄長對弟弟說話的語氣。與之相反，疑辨精神強烈的宋人則直指〈書序〉不合理，蘇軾(1037-1101)就批評說：「康叔，成王叔父而周公弟，謂之『孟侯』則可，謂之『小子』則不可，且謂武王為寡兄，此豈成王之言？」²⁸朱熹(1130-1200)亦不滿意《孔傳》的解釋，謂：「豈有周公方稱成王命命康叔，而遽以己意而告之乎？」²⁹宋儒雖已察覺成王說的問題，但並未將〈康誥〉之王指向周公。

宋人轉而懷疑〈康誥〉一篇存有錯簡。從篇首「惟三月」至「乃洪大誥治」一段，蘇軾《書傳》云：

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此，皆〈洛誥〉文，當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前。何以知之？周公東征，二年乃克管、蔡，即以殷餘民封康叔，七年而復辟。營洛在復辟之歲，皆經文明甚，則封康叔之時，決未營洛。又此文終篇初不及營洛之事，知簡編脫誤也。³⁰

蘇軾以為，〈康誥〉首段有「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句，依〈洛誥〉之文，營洛當在周公七年還政之時，與〈康誥〉時代不合。因此，此四十八字顯係錯簡，當還繫於〈洛誥〉篇前。

除錯簡說外，宋人胡宏(1105-1161)、吳棫(1100-1154)、朱熹等人更進一步推

²⁷ 舊題孔安國傳，孔穎達等正義：〈康誥〉，《尚書正義》，卷14，頁201a。

²⁸ [宋]蘇軾撰，舒大剛、張尚英校點：〈康誥〉，《東坡書傳》，收入舒大剛、李文澤主編：《三蘇經解集校》（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311。

²⁹ [宋]黎靖德輯，鄭明等點校：〈尚書一〉，《朱子語類》卷79，收入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7冊，頁2720。

³⁰ 蘇軾撰，舒大剛、張尚英校點：〈康誥〉，《東坡書傳》，頁310。

論，〈康誥〉非作於周公、成王之時，而應定為武王時書³¹。宋人的推論邏輯是，若移除篇首四十八字，後文的「王若曰」就不限定在成王或周公，而篇中能稱呼康叔「朕其弟」的王，即非武王莫屬。

不過，徐復觀(1904-1982)則批評宋儒之說是泥於君臣大義、強作曲解，只因周公稱王與宋儒君臣之分的觀念不相容，因此宋儒才將《尚書》中無法解釋到成王身上的，只好說是武王。而且在〈康誥〉篇中，分明有「殷先哲王」、「殷罰殷彝」、「以殷民世享」等句，殷地在武王時期是封給商紂後裔武庚，武王又怎能再以此地敕封康叔³²？故認為武王之說的主張甚不合理。

至於〈酒誥〉、〈梓材〉與〈康誥〉是否屬於一組整體的篇章？《史記·衛康叔世家》說法同於〈書序〉³³。不過，屈萬里(1907-1979)考辨三篇後指出，〈康誥〉時王呼康叔為弟，可知是篇為武王封康叔於康之誥辭；〈酒誥〉篇中有「明大命于妹邦」語，時間應為武庚亂平後，封康叔於衛時；而〈梓材〉一篇，前後文脈不相連屬，可能有脫簡，抑或由兩篇誤合為一篇，時代不能確知³⁴。從而否定〈書序〉以三篇為同時代的說法。

(二) 成王年紀的考辨

因為《尚書》中屢用「孺子」、「沖子」來稱呼成王，故一般認為成王年紀幼少，無法應付周初尚未穩固的政治局面，致使周公必須攝政或稱王來承擔重任。然而成王具體年齡為何？諸家說法卻不一。賈誼(200-168 B.C.)曰：「周成王年六歲，即位享國。」鄭玄(127-200)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王充(27-97)謂成王初服厥命乃「十五生子」，王肅(195-256)以為「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史記·

³¹ 王柏《書疑》云：「後世信〈小序〉，以此篇為成王告康叔之書，又言周公託王命而言，不勝纏繞。至本朝蘇軾，方明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脫簡。五峯胡先生及吳氏棫，又定為武王之書，大綱方見倫次。」〔宋〕王柏：《書疑》卷6，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據復旦大學藏清康熙《通志堂經解》本影印），第42冊，頁406。

³² 徐復觀：〈與陳夢家屈萬里兩先生商討周公且曾否踐阼稱王的問題〉，《東方雜誌》復刊第6卷第7期（1973年1月），頁39、44。

³³ 《史記·衛康叔世家》：「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司馬遷撰，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卷37，頁1590。

³⁴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3年），頁145、157-158、167。

蒙恬列傳》則謂：「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³⁵

大致而言，以武王崩後，「成王年十三」為主流說法。因為《荀子》曾言：「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³⁶又學者普遍接受周公七年反政之說，如以二十歲行冠禮往前減七年，歲數即落在十三左右。

不過，亦有學者認為，成王年紀其實並不幼少。清人莊存與(1719-1788)即謂：

周公踐阼，君子有知其誣者，而不能知成王即位其年不幼也。何以徵之？徵之於《書》。《書》曰：「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豈教誨稚子之言乎？王又能通其說，心不謂然，能不宣之於口，豈尚須人抱負耶？夫孺子、沖子，家人、壽考相與之常言，「予沖子」、「予小子」，古天子通言上下之恆辭，不以長幼而異者，則《書》之訓絕無可據為幼不能涖阼之徵矣。³⁷

莊氏引〈金縢〉內容為證，認為成王既能讀懂周公所獻〈鴟鴞〉詩的意涵，而且內心雖然不悅周公，卻仍知道要隱藏真實心意，而不出言責備，顯然成王的心智及城府絕非幼少之屬。至於《尚書》中所謂「予沖子」、「予小子」的稱呼，則是古代天子自稱的恆辭，不能當作實際年齡看待。

近代學者亦有持類似見解者，例如馬承源就認為，成王自稱「沖子」、「小子」，乃是王者的謙稱，與舊說成王幼小無關³⁸；李裕民指出，《尚書》說成王年幼，但當時「幼」的含意和現在不太一樣，因為《禮記·曲禮上》《疏》云：「幼者

³⁵ [漢]賈誼撰，閻振益、鍾夏校注：〈修政語下〉，《新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卷9，頁371。鄭玄注，[宋]王應麟輯，[清]孔廣林增訂：〈金縢〉，《尚書鄭注》（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據清嘉慶間張氏照曠閣《學津討原》本影印），卷5，頁348a。[漢]王充撰，黃暉校釋：〈率性篇〉，《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卷2，頁68。舊題孔安國傳，孔穎達等正義：〈洛誥〉，《尚書正義》，卷15，頁225a。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蒙恬列傳〉，《史記》，卷88，頁2569。

³⁶ 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儒效〉，《荀子集解》，卷4，頁115。

³⁷ [清]莊存與：《尚書既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據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刻本影印），第44冊，頁232b。

³⁸ 馬承源：〈西周金文和周曆的研究（節錄）〉，郭偉川編：《周公攝政稱王與周初史事論集》，頁112。

自始生至十九歲時。」故凡未滿二十歲者都可稱為幼³⁹；屈萬里則根據〈多方〉記載，謂成王繼位不久即有能力親自踐奄，推斷成王年紀或在二十歲以上⁴⁰。是持成王年齡不幼者，數亦甚夥。

雖然目前缺乏直接證明成王具體年紀的文獻資料，但可以肯定的是，諸說之中，成王「襁褓說」是較為不可信的。因為襁褓說出現時間甚晚，先秦人只說成王幼，或謂成王少，並未有文獻指稱成王為襁褓小兒。所見最早資料僅有《呂氏春秋·下賢》云：「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⁴¹西漢時期卻開始大量出現此類說法，如伏生《尚書大傳·金縢》、賈誼《新書》中〈保傅〉及〈胎教〉兩篇、董仲舒《春秋繁露·郊事對》、司馬遷《史記》中〈魯周公世家〉及〈蒙恬列傳〉兩篇、桓寬《鹽鐵論·未通》、劉向《說苑·尊賢》、《大戴禮記·保傅》等等，皆言成王年在襁褓中。

顧頡剛認為，「襁褓說」應是秦、漢間人把成王年幼傳說極度誇張，演變而來的結果⁴²。正因為西漢時期盛行成王為襁褓幼兒的傳說，所以漢武帝才會請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以朝諸侯圖」賜給霍光，王莽也才有藉口扶立年僅兩歲的孺子嬰，由自己居攝踐阼。這些行為的背後預設，是建立在西漢時人對此一傳說的共同認知上。

（三）周初王位繼承制度

按《尚書·金縢》所載，周初政治在武王崩後，經歷過一次重大動盪，因為王室成員管叔及群弟不滿周公執政，於是在國內散布「公將不利於孺子」的流言。然而，有學者以為，周初的王位紛爭，雖然看似焦點為周公攝政的問題，但其實質卻是「立子」還是「弟及」的紛爭。王冠英就指出，周人雖自古公亶父起已實行「父死子繼」的繼承制度，正常情況下父子相承，但遇到變故時，則以兄弟依次相及；

³⁹ 李裕民：〈周公篡位考——從「桐葉封弟」的疑案說起〉，《晉陽學刊》，1984年第4期，頁104。

⁴⁰ 屈萬里：〈西周史事概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2本第4分（1971年12月），頁781-782。

⁴¹ 〔戰國〕呂不韋撰，陳奇猷校釋：〈下賢〉，《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15，頁887。

⁴² 顧頡剛：〈周公執政稱王——周公東征史事考證之二〉，頁38。

武王去世前，因為太子年幼，曾想以「兄終弟及」的形式傳位給周公⁴³。其說之依據，來自《逸周書·度邑解》中武王對周公的一段話：

王曰：「旦，汝維朕達弟，予有使汝。……乃今我兄弟相後，我筮龜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建。」叔旦恐，泣涕共手。⁴⁴

是篇載武王自知將臨終，召周公前來交代遺言。武王表示，希望以「兄弟相後」方式將王位傳給周公，周公卻涕泣拱手，沒有接受。杜勇認為，這說明在武王眼中，周公是最有資格繼承王位的，周公不願意接受兄終弟及，大概是考慮到如此會不利於內部穩定⁴⁵。類似見解，早在晚清已有學者提出，廖平《經話》云：

周公、成王事為經學一大疑。……武王克殷後，即以天下讓周公，《逸周書》所言是也。……蓋商法兄終弟及，武王老，周公立，常也。當時初得天下，猶用殷法。自周公政成之後，乃立周法，以傳子為主。周家法度皆始於公，欲改傳子之法，故歸政成王。⁴⁶

王國維(1877-1927)〈殷周制度論〉亦有詳細考證：

商之繼統法，以弟及為主，而以子繼輔之，無弟然後傳子。……故大王之立王季也，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周公之繼武王而攝政稱王也，自殷制言之，皆正也。……舍弟傳子之法，實自周始。當武王之崩，天下未定，國賴長君。周公既相武王克殷、勝紂，勳勞最高，以德、以長、以歷代之制，則繼武王而自立，固其所矣。而周公乃立成王而已攝之，後又反政焉。攝政者，所以繼變也；立成王者，所以居正也。自是以後，子繼之法遂為百王不易之制矣。⁴⁷

持此論者依據《逸周書》而認為，周初傳位制度仍襲用商代的「兄終弟及」制，因此，周公不論就其輔佐武王克殷的功勳，或是其所具備的政治實力，甚至從傳位的

⁴³ 王冠英：〈周初的王位紛爭和周公制禮〉，郭偉川編：《周公攝政稱王與周初史事論集》，頁 117-118。

⁴⁴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度邑解〉，《逸周書彙校集注（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卷 5，頁 474-479。

⁴⁵ 杜勇：《尚書周初八誥研究（增訂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年），頁 27。

⁴⁶ 廖平撰，楊世文點校：《經話·甲編》，卷 1，頁 234。

⁴⁷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謝維揚、房鑫亮主編：《觀堂集林》，收入《王國維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年），第 8 卷，頁 304-305。

法理制度層面而言，皆是最有資格繼承武王之位的人。然而，周公鑒於傳位制度所引發的混亂（此牽涉管叔排行，以及是否有優先繼承權問題⁴⁸），於是在政局穩定後，周公不但致政成王，更親自定立傳子之法。換言之，周代以及後世施行的「父死子繼」制度，其創立者正是周公。但在此之前，西周初年的傳位制度仍以「兄終弟及」為主。

但周初的傳位制度是否實際施行兄終弟及之制？有學者卻持懷疑態度。啟良即舉出：1. 據《史記·周本紀》所載，從后稷到周武王，共十六王，其王位繼承皆為父死子繼，無一例為兄終弟及，可知在周公以前，周王室已施行父死子繼制。2. 《逸周書》僅有〈度邑解〉「乃今我兄弟相後」為支持周初行兄終弟及制的孤例，然而包含〈武儼解〉和〈五權解〉等篇內容，卻都提到武王意在傳位成王，並希望周公輔佐，可知兄終弟及制度的推論並非可靠確實。3. 周初若非已實行子繼制度，則管叔散布「公將不利於孺子」的流言，就不會成立⁴⁹。可知仍有學者堅持主張父死子繼制。是以在周初王位繼承問題上，同樣沒有取得有志一同的共識。

（四）先秦、兩漢描述周公政治身分的詞彙

周公稱王爭議既由王莽引起，王莽以前的人如何認知周公政治定位，即成為考辨周公是否稱王的關鍵問題。先秦載籍用以描述周公政治身分詞彙不一，諸如：假為天子（《尸子》、《韓非子·難二》）、履天子之籍（《荀子·儒效》、《淮南子·泛論訓》）、踐天子之位（《逸周書·明堂解》、《禮記·明堂位》）、相王室（《左傳·定公四年》）、相天子（《逸周書·作雒解》、《墨子·貴義》）、攝政（《尚書大傳·洛誥》、《史記·燕召公世家》）、踐阼（《尚書大傳·略說》、《史記·魯周公世家》）等等。

其中，以「踐天子之位」、「履天子之籍」以及「踐阼」幾個詞彙，學者解釋意見分歧較大。踐天子之位、履天子之籍，意謂周公曾經在王的位子處理政事；而

⁴⁸ 《史記·管蔡世家》曰：「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孟子·公孫丑下》亦云：「周公弟也，管叔兄也。」皆以管叔排行先於周公。若依兄終弟及制而言，管叔應有王位優先繼承權。故持此論者以為，管叔的叛亂，雖是以「公不利於孺子」為藉口，但實際上卻是想爭回自己的王位權利。

⁴⁹ 啟良：〈周公事迹新說〉，《江漢論壇》，1991年第5期，頁61-62。

踐阼，《說文解字》云：「阼，主階也。」段玉裁(1735-1815)曰：「古者天子踐阼臨祭祀，故國運曰阼。」⁵⁰可知「阼階」原為主人迎賓之處，天子阼階則有象徵帝位之意。有學者即根據這些詞彙而肯定認為，先秦及兩漢人都知道周公稱王，如劉起鈞(1917-2012)就說：

當武王死後，周公履天子位以稱王，這一歷史事件，直到戰國時還為人所知。……戰國時確保存了西周傳下來的周公踐天子之位的說法，它與《尚書》中周初諸誥全是周公處理政務的紀錄這一事實是完全符合的。⁵¹

他並且認為，周公稱王的史事，一直延續到西漢前期，仍為人所知。歷史學家鄧嗣禹(1906-1988)同樣肯定這些詞彙表示周公稱王，他說：「是《禮記》不但明言周公攝政，而且是『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換言之，便是周公作了七年皇帝。」⁵²金景芳(1902-2001)亦云：「周公『踐阼』，也就是即天子位。」⁵³這些學者的共同之處，是指出這些詞彙既然描寫周公站/處於天子的位子，即等同說周公是天子本人。

但另有一派學者認為，這些詞彙僅能顯示周公曾經代理王政，不能作為周公僭越身分、即位稱天子的直接證據。例如屈萬里辨析道：

阼，是東階，也就是主人登堂所由之階。君王為全國之主，登堂必由阼階，自不用說。而代理（攝位）君王的人，照樣可以由阼階登堂；但代理君主的人，卻不能自稱君王。這正如民主國家，總統如因故不能視事、而由副總統代理時，副總統照樣可以在總統的辦公室發佈命令，照樣可以在總統的禮堂接受外國大使呈遞國書，但卻不能自稱總統一樣。此理甚為明顯。從先秦和兩漢的史料看，稱周公踐阼和當國者，固然很多；可是絕對沒有說周公「踐阼稱王」的。⁵⁴

換言之，不論是天子本人，或是代理天子之政者，其處理政事時都會處在「天子之

⁵⁰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年），第14篇下，阜部，頁12。

⁵¹ 劉起鈞：〈由周初諸「誥」的作者論「周公稱王」的問題〉，《人文雜誌》，1983年第3期，頁68。

⁵² 鄧嗣禹：〈周公史說演變考〉，《女師大學術季刊》第2卷第2期（1931年4月），頁5。

⁵³ 金景芳：〈周公對鞏固姬周政權所起的作用〉，郭偉川編：《周公攝政稱王與周初史事論集》，頁64。

⁵⁴ 屈萬里：〈關於所謂周公且「踐阼稱王」問題敬復徐復觀先生〉，《東方雜誌》復刊第7卷第7期（1974年1月），頁37。

位」(以今日言之即「總統辦公室」)。但是不能以此武斷推論代理政事者即為天子本人。況且，在王莽以前，從未有文獻直稱周公為「王」的，因此這些詞彙能否等同「周公稱王」，頗值得懷疑。但此說可以討論的地方在於，總統、副總統的代理制度，畢竟是現代國家的政治模式，是否能夠合理類比於西周初年的狀況，仍有待商榷。

事實上，學者對於「周公稱王」問題爭論不休的最大原因，是對《尚書》或是早期文獻記錄字詞解釋不同所致。由於《尚書》文字艱澀，古人已有難以通解的感嘆，而傳世文獻或地下出土材料，研究者的詮解亦不盡相同。各持己見的結果，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就會產生解釋分歧的論辯。

四、近代學者的四種立場

顧頡剛曾經將清代以前人對周公攝政稱王的討論，以三個階段劃分：1. 戰國、秦、漢間人的「周公攝王」說；2. 東漢至魏、晉間人的「周公以成王命誥」說；3. 宋、清間人的「〈大誥〉、〈康誥〉、〈酒誥〉、〈梓材〉中的王都為武王」說⁵⁵。雖然顧氏的三階段說是較為簡略的分期，是否能夠涵蓋當時人的說法，仍有商榷的空間，而且不免帶有自身立場。不過作為初步研究的基準依據，還是有其參考價值。至於晚清、民國以後，陸續有西周相關的銅器銘文被發掘出來，為周公稱王的歷史公案提供不少新的考證材料。然而這些看似可以幫助釐清問題的地下文物出土後，實際上卻沒有讓周公稱王的爭議平息下來，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郭偉川指出，近代學者對此問題的立場大致有三：一種是認為周公不但實際執政，並且在名義上也稱王；第二種說法與前說完全相反，主張周公既未攝政，亦無稱王；三是折衷前兩說，以為周公有攝政，但未稱王⁵⁶。其後，呂廟軍又在郭氏基礎上補充第四種立場，加入周公執政實為篡國說⁵⁷。這四種立場，實際上又可簡化為「稱王派」(執政且稱王、篡國說)和「未稱王派」(既未攝政亦無稱王、有攝政未稱王)兩種。

⁵⁵ 顧頡剛：〈周公執政稱王——周公東征史事考證之二〉，頁 34-62。

⁵⁶ 郭偉川：〈周公稱王與周初禮治——《尚書·周書》與《逸周書》新探〉，《周公攝政稱王與周初史事論集》，頁 187。

⁵⁷ 呂廟軍：《周公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17。

（一）周公既攝政且稱王

顧頡剛主張，周公不但曾經實際執行王政，並且在史書記載中也以王的身分出現。他說：

武王死後，周公奉了武王長子誦繼位，是為成王。為了這個新造的大邦還沒有穩固，內憂外患接疊而來，非由一個才幹和威望兼全的人擔負起領導的責任不可，所以就由周公執行王政。周公既站在王的地位，發揮王的權力，人們口頭上也就稱他為「王」，史官記錄他的文告時也就寫作「王若曰」。⁵⁸

周公執政稱王與周初背景緊密相關，當時只有周公能夠肩負重任，又由於周公為實際的執行王政者，因此人民和史官皆稱其為「王」。顧氏還認為，周初可能與古希臘斯巴達一樣存在著「雙首長」制：

我國商代史料中看不出是否有兩頭政長，周初還在奴隸社會時期，沿用兩頭政長制應是可能的。到了後世，這種事情早已不在人們的記憶中了，所以《孟子·萬章上》假借了孔子的話，說「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這本是到了戰國中期，統一條件漸已具備，割據性的領主制政治日益解體，人民共同希望有一個中央集權專制政府出來，統治「天下」，從此脫離了爭城奪地、生靈塗炭的痛苦。⁵⁹

指出中國早期的雙首長制，一直要到戰國中晚期後，因人們渴望結束戰爭，方為中央極權政體所取代。他認為，武王死後，東方諸國叛周，管、蔡和周公又激發了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此時成王垂拱西都，周公則興師東征。當時，周公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地位，就如同古羅馬的列克斯，同時兼具將軍職和祭司職，可以稱天而治⁶⁰。於是成王與周公，形成內、外雙首長的情況。顧氏主張，「周公稱王」也應在此一背景下理解。

郭偉川認為，因為周公曾經執政稱王，後來又將政權送給成王，因此在史書記載上才會呈現複雜的雙重身分。他說：

致政子誦前，他是王，因此具有君的身份；致政成王後，他北面就臣位，因此又具有臣的身份，此時又稱為「周公」，故此史官往往以後之職銜稱述前

⁵⁸ 顧頡剛：〈周公執政稱王——周公東征史事考證之二〉，頁 16。

⁵⁹ 同前註，頁 56。

⁶⁰ 同前註，頁 55。

事，許多歷史研究出現混亂也往往由此引起。所以《周書》諸篇有數處出現「周公曰、王若曰」這種極為奇怪的情形，就是因為周公既為君又為臣的這種極為特殊的雙重身份造成了雙重稱謂，因此也引起二千多年來對《尚書·周書》諸誥研究、譯註上的爭論不休，至今尚糾纏不清；尤其導致過去對周公地位問題的研究造成很大的誤會。⁶¹

郭氏的論述主要是在解釋：何以周公分明以王的身分攝政，但《尚書》的記錄中卻有「周公曰」，或「周公曰，王若曰」的矛盾存在？他並且指出，周公將自己辛苦經營的王業和王位致送成王，成王則以天子禮樂尊祭周公，這種叔姪相善的美事，實為西周史的佳話。因此周公稱王之事是無須掩蓋與抹殺的，這既無損周公作為儒家元聖的形象，反而顯示其人格之偉大。他批評，某些後儒拘於周公制禮作樂，認為儒家元聖絕不可能僭禮稱王之成見，意欲美善周公，反增累贅，致使異說多歧，而令稱王之事成為千古之惑。

（二）周公既未攝政亦無稱王

另有一派學者認為，周公在西周初年的政治地位，其實不如傳聞般顯赫，現為人所熟知的周公形象，乃是後人所增塑出來的。馬承源為主張此說的學者之一，他使用的論證方法，是以出土青銅器來反駁傳世文獻的記載。其舉〈小臣單觶〉、〈禽簋〉、〈宜侯矢簋〉三件文物為證：

- 1.〈小臣單觶〉：王后黜克商，在成師，周公錫小臣單貝十朋，用作寶尊彝。
- 2.〈禽簋〉：王伐（奄侯），周公謀禽祝，禽又啟（有振）祝，王易（賜）金百孚（銜）。禽用乍（作）寶彝。
- 3.〈宜侯矢簋〉：惟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圖，遂省東或（國）圖。

其中，〈小臣單觶〉是記伐武庚事，銘中王與周公的主次分得很清楚；〈禽簋〉銘文有成王、周公和伯禽三人，伐奄侯的是王（採唐蘭說），謀者是周公；康王時代的〈宜侯矢簋〉言武王、成王伐商，當中沒有提及周公。馬氏解釋說：

〔禽簋、宜侯矢簋〕這兩件器的銘文都記錄了成王作為天子的領導作用，根本否定了史籍訛傳的周公「踐祚稱王」。……由此可見，金文中的史實和史

⁶¹ 郭偉川：〈周公稱王與周初禮治——《尚書·周書》與《逸周書》新探〉，頁 204。

籍的真實記載，都說明成王是嗣位之君，並且起著一個國君應起的作用，周公和召公只是輔相成王。⁶²

馬氏認為，周公的形象是被漢儒大加誇飾，而使後人產生的錯覺，周公不僅沒有稱王，甚至連所謂的周公攝政，實際上也根本不存在。從頭至尾，周公僅為輔相之職而已。真正居於天子之位，並且執行天子之政的，乃是周成王。

彭裕商也持相同意見，他認為歷史上並不存在周公攝政之事。其理由是：1. 記載周公攝政的典籍，其成書年代最早只能上溯到戰國晚期，前此尚無此說法。2. 「成王幼」的說法與史實不符，明顯是應周公攝政說的需要而杜撰出來的。3. 〈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語句，是說周公自武王克商以來輔助王室，至此共七年；所謂「七年」是武王二年加成王五年，並非是說周公攝政七年。4. 周公曾於武王死後出走，當時已自顧不暇。5. 在周王朝整個平叛的軍事行動中，主帥都是成王，周公只居次要的輔相地位⁶³。他據此推論，周公攝政的說法，乃是戰國晚期對周公事迹層層加碼的結果。

持周公既未攝政亦無稱王觀點的學者，大多強調周公身為「輔佐」的身分，並認為成王年紀已年長到足堪承擔天子重任，因此也不需要藉由周公攝政來穩定政治局勢。他們甚至批評，後世為了誇飾、表彰周公功勞，進而掩蓋、削弱了周成王實際上的政治能力與作用。

（三）周公有攝政但未稱王

楊向奎(1910-2000)為顧頡剛學生，但他對顧氏考辨周公稱王的主張，卻提出質疑的觀點：

顧先生是我的老師，在五十年代的追隨中，我深知老師的學風是「大膽的懷疑」，這可能與胡適先生的「大膽假設」有關，因為他們也是師生。但這篇文章中〔筆者案：指〈周公執政稱王——周公東征史事考證之二〉一文〕，先生一改多疑的作風，改為「全信」。我曾經說過，今文經師於劉歆、王莽的作為深惡痛絕，因云他們為了篡權而篡改古史，但於周公之稱王，晚清今文學者則採全信的態度，廖乎如此，顧先生亦復如是，但此中許多問題，有待

⁶² 馬承源：〈西周金文和周曆的研究（節錄）〉，頁 110-111。

⁶³ 彭裕商：《西周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3 年），頁 43。

澄清，先生所舉證，須重新探討。⁶⁴

經過親自實際考證，他的見解則是：

我以為周公並沒有「稱王」，但在成王初年曾經攝政，所有成王時《周誥》都是周公代成王宣告而稱王，周公沒有自己稱王。⁶⁵

楊向奎所指成王時《周誥》，包括〈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等篇。而〈洛誥〉雖記周公「復子明辟」事，但這一年周公並未完全免去攝政重任，要在稍後的〈立政〉篇，「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正式宣告嗣天子為王，這才是成王親政的開始。前此成王稱王，周公並沒有稱王。

楊向奎既反對周公稱王之說，亦不認同周公從未攝政的說法。他表示：

我們不同意周公執政稱王說，因為那樣無法解釋《周誥》及銘文中成王之稱王，而周公只稱周公，而〈金縢〉之：「管叔及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既已稱王，則非「將不利於孺子」，已是不利於孺子的事實。「將不利」還是假設，從側面可以說明周公攝政未稱王。但如為稱王亦未攝政，周公地位與群公等，則此流言無據，因為他們沒有反對周公的必要！⁶⁶

楊氏從《尚書·金縢》描述武王崩後的情事，推論周公攝政應是事實，但周公並未稱王。理由是，倘若周公在其時已經稱王，則「公將不利於孺子」的流言即顯不合理，因為周公不利孺子已成事實，管、蔡懷疑造謠的情節便無處安放。又倘若周公連攝政都未有，如此則周公地位與群公等同，管、蔡等人也根本沒有反對周公的必要。他從而批判「稱王」與「未攝政」兩說，皆不合情理，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王冠英認為，周公攝政但不繼位稱王，是出於政治策略的考量。他說：

周公在當時採取這樣的辦法來穩定國內外的局勢，用意是非常深刻的：第一，「當武王之崩，天下未定，國賴長君」，他以在武王時即以輔政建勳的地位攝政當國，能夠控制局勢，防止「諸侯叛周」。第二，在王位繼承最敏感的問題上，管叔不堪其任，自己以弟及嗣立又不可避免地引起王位糾紛，

⁶⁴ 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145。

⁶⁵ 同前註，頁155。

⁶⁶ 同前註，頁157。

在這種情況下，為穩定局勢計，最好的辦法只能是「父死子繼」，由他來攝政度過危局，濟變繼絕。⁶⁷

當時的歷史實情是武王去世前，因為太子年幼，曾想以兄終弟及的方式傳位周公，但周公沒有接受，而是讓成王嗣立，自己「攝行政當國」承擔起穩定政治局勢的責任。周公的處境確實讓他左右為難，因為太子幼小，確實不堪重任；但自己若按兄終弟及嗣位，則年長且對王位有野心的管叔勢必不服。最後周公運用智慧所施行的策略，是扶立武王之子繼位，再由自己攝政以度過政治危機。

（四）周公執政實為篡國

最後一種說法出現時間稍晚，但對於周公人格的批評最為激烈。他們指稱周公乃是篡奪王位的陰謀家與野心者，所謂的周公攝政或周公執政，是後世粉飾美化周公形象的說法。例如啟良指出：

近來筆者考先秦史籍，發現周公其人其事與傳統說法相距甚遠。周公非但沒有輔佐成王，而是篡奪成王位，自為天子。幾年後，也沒有歸政成王，而是另立新都，與成王政權並立，形成東西分治的局面。⁶⁸

他認為周公得天子位，完全是依仗自己在周王室權位而謀篡來的結果，因此才遭到管叔及群弟的誹謗和攻擊，而有所謂的「三監之亂」。周公居東既不是東征，也不是避居東都，而是流亡東方。其情況很可能是：在周公出兵東征的過程中，成王及召公等六臣趁其不在國都鎬京，廢了他的天子名號，並拘捕其黨屬，成王自己即位為天子。等周公平定三監之亂後，不能回鎬京，只能流亡東方⁶⁹。周公雖然流亡東方，但仍擁有強大的軍事勢力，既然不能回鎬京，便割地稱雄，與成王的政權分庭抗禮，洛邑即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建立的。

相較於周公的謀權篡位，李裕民認為，管、蔡反而才是保衛周王室的忠臣。管叔為保護成王，反對周公奪權，因此攻打周公的據點成周，其中絲毫沒有自立為王之意。至於史載所謂的「畔周」，乃是周公等人強加給管、蔡的罪名，後人據此記載下來，使管、蔡蒙受了千年不白之冤。歷代唯有明朝祝允明(1461-1527)看透其

⁶⁷ 王冠英：〈周初的王位紛爭和周公制禮〉，頁 118。

⁶⁸ 啟良：〈周公事迹新說〉，頁 60。

⁶⁹ 同前註，頁 63。

中奧秘，而稱「管、蔡為忠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祝子罪知條），但其說卻沒有得到重視⁷⁰。

主張周公篡國說的學者，大都極力否認並試圖破除周公的聖人形象。如李裕民說：「我們知道，周公作為聖人是後人捧起來的，實際上他不是那麼完美的聖人。」⁷¹他認為戰國時代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周公被儒家捧為聖人，但「篡位」與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信條不合，於是儒家便極力抹殺掩蓋這一史實，按照自己的需要去打扮周公。鄧嗣禹亦指出，周公人格是經過儒家塑造，進而影響後世觀念深遠：

周公在我們腦子中的印象，總以為是一個大聖人。這種印象全是傳統觀念所造成，環境勢力所養成的。俗說，人是環境的動物，又說時勢造英雄；周公的聖名，便是儒家支配環境所造成的。儒家支配中國兩千餘年的思想，將周公的聖臺造得根深蒂固，後人習焉不察，就很少有人敢懷疑他的人格了。⁷²他認為周公的人格並不完美，如以〈金縢〉的記載來看周公，鄧嗣禹分析說：

他替武王祈禱代死時，築了臺，招了先靈，頂了圓玉，捧了長方玉，旁邊站著通表疏的法師，占卜吉凶的起課先生，背著眼睛一想，周公竟是一個裝神作怪的道士！……他去祈禱，以身代死，這是村里巫媪所做的事情，也即是周公是一個村里巫媪的人物！……後來武王的病好了，他那篇私禱的冊文，燒了可以；藏放私人的屋裏也可以；而他小心翼翼的，把那篇禱文鎖在金質封固的金櫃裏，預備後日去邀功免罪，這是證明周公是一個慣於「未雨綢繆」的陰謀家！……所以單就〈金縢〉篇看來，他也沒有什麼「可觀」的了。⁷³

就文義看〈金縢〉篇所記周公言行，分明是一個鬼計多端，慣於未雨綢繆的陰謀家，假冒的偽善者，以及卑鄙齷齪的道士。然而，自從孔、孟等儒家的推崇，加上司馬遷《史記》的美化，周公於是從一個毀多於譽的人物，搖身一變而成為儒家的大聖人。如以理性邏輯作分析推斷：「假使周公無陰謀，管、蔡與他同受良好的母教，何以要無故流言？假使周公無陰謀，召公亦賢人，何以要不悅？假使周公無陰

⁷⁰ 李裕民：〈周公篡位考——從「桐葉封弟」的疑案說起〉，頁 105。

⁷¹ 同前註，頁 100。

⁷² 鄧嗣禹：〈周公史說演變考〉，頁 27。

⁷³ 同前註，頁 29。

謀，成王雖幼，周有八士，何必要攝政？」⁷⁴可知周公的真實面目，並不如後世傳聞那般偉大賢能。

五、結 論

周公所處時代距今久遠，但自孔子夢見周公以來，其地位雖世有升降，但始終居於傳統聖人之位，且據傳部分經學典籍的制作也與其有關。周公是否稱王的爭議，最初由王莽代漢事件所引發，前此周公的政治身分並未特別啟人疑竇，此後則成為經學史上聚訟不休的疑案。

本文首先敘述西漢時期，因為漢儒對周公政治形象與傳說的描繪，西漢政壇曾發生「霍光輔政」與「王莽居攝」兩次模仿事件，只是結局與過程大不相同，霍光始終位居輔臣，王莽則代漢自立。由於王莽事件的歷史評價負面，後世學者遂開啟對周公執政問題的考辨，無論所持意見或正或反，問題根源皆由王莽而起。

其次，論述歷來爭辯周公執政稱王的幾個問題：1. 《尚書·周書》中的「王」為誰？〈大誥〉有所謂周公說、成王說和武王說之爭，〈康誥〉同樣有周公說、成王說、武王說之辯，究其問題癥結，在於《尚書》文句各家解讀不同，立場紛紛，各執己見，至今難以取得共識。2. 關於成王年紀的考辨。武王崩後，成王之年有六歲、十歲、十三歲、十五歲與襁褓中等諸說，同時亦有學者考證，認為成王年紀不幼。諸說紛紜中，可以確知者，即「襁褓說」乃西漢後起之說，是秦、漢間人對周公傳說層累疊加的結果，確屬不可信。其餘諸說則各據文獻推論。3. 周初王位繼承制度的討論。學者有持「兄終弟及」和「父死子繼」兩種，前者依據《逸周書·度邑解》武王曾謂「乃今我兄弟相後」，而認為周公擁有繼承權；後者則以為周初已穩定施行父死子繼制度，成王乃唯一合法繼承人。4. 先秦、西漢人是否有周公稱王的認知？學者對於先秦、兩漢載籍中，描述周公政治身分詞彙的判定不同，紛爭尤其集中在「踐天子之位」、「履天子之籍」及「踐阼」等字詞解釋。有認為周公在天子之位即是天子，亦有認為，代理政事者也可居天子之位，但並非天子。此爭議與《尚書·周書》之王的論辯相同，皆導源於對字詞釋讀的差異。

其三，討論近代學者對「周公稱王」問題的四種立場和主張。近代雖有地下出

⁷⁴ 同前註，頁 35。

土文獻可與紙上證據相互考證，但仍未能解決周公稱王的紛爭，學者更衍生出「周公既攝政且稱王」、「周公既未攝政亦無稱王」、「周公有攝政但未稱王」、「周公執政實為篡國」等四派說法。主張周公未稱王的學者，有持周公實際上掌權或攝政觀點的，亦有認定周公僅為輔相，從未攝政的。而主張周公稱王和周公篡國的學者，或批判先儒拘於君臣大義而否認稱王事實，以為周公稱王又致政，正顯其偉大；或認為周公形象乃後人所塑造，實際上為陰謀家、篡位者。可知即使是立場相同者，其所持論據與觀點，仍可能大相徑庭，足見此議題的多元面向與複雜程度。

周公稱王與否？或許至今仍未有服悠悠之心的解答，若想按現有證據為此樁千古公案做出定讞，實際上也頗為困難。但具有學術意義的研究在於，可由時代先後爬梳文獻，考察周公身分及形象的衍變，並釐清文獻產生問題的癥結與關鍵之處；再者，是探究歷代學者如何考辨、討論此一問題，以及其主張和觀點是如何形成的。如此，雖未必能獲得所謂歷史真相，但至少能使此議題的流變面貌清晰呈現。